

宋家宏◎著

阐释与建构

——云南当代文学专论

云南当代文学的两个传统

被遮蔽的云南城市文学

识别《0档案》

质疑“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冯牧：杰出的文学组织工作者

AN SHI
YU JIAN GOU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阐释与建构

——云南当代文学专论

宋家宏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 SHI
YU JIAN GO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 / 宋家宏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5 (2012.1 重印)
ISBN 978-7-222-07777-5

I . ①阐… II . ①宋… III . ①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云南省 IV . ①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2009 号

责任编辑：苏映华 马跃武
创意设计：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书 名	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
作 者	宋家宏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7777-5
定 价	30.00元

目录CONTENTS

第一辑 广角扫描 1

超越题材：云南文学摆脱窘困的选择	2
边地小说与主流文化	7
云南作家与民族、地域	13
云南当代文学的两个传统	21
关于“二十世纪云南文学”	33
立体的云南	40
昆明在呼唤这个城市的代表性作家	43
重建云南文学批评	50
云南的四代作家群	59
被遮蔽的云南城市文学	69
昭通作家群的成长与未来	76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84
应当重视云南五六十年代电影的经验总结 ..	92
重返批评的隧道	95

第二辑 变焦审视 107

冯牧：杰出的文学工作组织者	108
李乔小说与二十世纪云南文学	112
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	120
识别《0 档案》	124
诗化的乡村生活	134
《世纪木鼓》：佤族人民奋进的史诗	137
二评夏天敏小说	141
三说潘灵的小说	146

关于玫瑰和她的母亲	154
自然的人生形式	158
李霁宇的两部长篇小说	162
渴望与飞翔	165
军人的体验和民族意识	171
左转、右转还是不转	175
吉成小说的艺术缺憾	179
诗人孙世祥	186
探寻者的心踪	189
杨杨和他的《雕天下》	195
忠实于自我的内心体验	200
漫游在云南西部密林中	205
特别关注（短篇十篇）	211

第三辑 短论聚焦 232

为了文学，向我开炮！	233
质疑“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	235
回到生活现场	238
扎实地从点滴做起	242
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陷落	247
文学奖及云南作家	250
关于作家“挂职”的思考	254

第四辑 相互映照 261

展示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262
关于云南文学批评	267
关于云南文学的几个问题	274

后 记 277

第一辑 广角扫描



超越题材：云南文学摆脱窘困的选择

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学有个光辉灿烂的美丽早晨，八十年代，云南文学处于窘困之中：云南作家不谓不勤奋，高产作家也多，集子多，长篇也不少，但能推出一比，引起读者比较广泛关注的“拳头作品”却不多。

云南的社会生活不谓不丰富多彩，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近年来产生了可喜的变化，还发生了“中国南方边境冲突”这样的大事。边地、高原、多民族更是永久的特色。

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学界产生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作家、诗人，如至今仍然活跃在云南文坛的李乔、晓雪、彭荆风、张长、张昆华、周良沛等，是他们为云南当代文学奠定了基础，为云南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争得了不可忽视的地位。近年来云南文学在“川军”“黔军”“晋军”“粤军”等外省文学的比照中，认识到了“滇军”的贫弱，尽管这认识来得太缓慢，是在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在无法回避的现实面前才痛苦的承认的，但是，这一认识标志了云南文学的重新觉醒，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文学界在议论纷纷，在寻找摆脱窘困的出路，很多人都在思考，我也在思考。

云南文艺界一开口讲的就是“题材”，总是问：“写的是什么题材？”这其实反映了云南文艺界“题材至上”的心理定势。

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学的成功其实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与规律，但理论界缺少深入的探讨、研究，至今对那一段光荣的历史仍然缺少宏观的、深层的研究，多数文章停留在对单个作家作品的阐释水平上，从多种角度对它做整体研究的文章还难以寻觅。客观地总结那一段文学的经验与规律，又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发展不可少的任务。由于缺乏深入研究，人们从表象上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题材层面，因为边疆风情、民族特色确实是那时云南文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那时的云南文学最鲜明的共同特色。成功，反而使今天的文艺界背上了包袱，将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学的成功仅仅归功于题材层面的成功，它逐渐形成了可以称为“题材至上”的心理定势：云南文学只要写了边地风光、民族特色，就有了成功的大半，再加上技巧的上达，对生活的熟悉，自然就是全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在云南就只有吃民族饭。”另外，云南这块祖国边疆，多民族聚居地的特点，又从客观上吸引着作家和读者，这类题材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定程度的反应，这一原因又强化了上述心理定势。“边地风光，民族特色”成了云南文艺界的“集体无意识”。

且不说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学绝非仅仅是题材意义上的成功，但只注意了题材，在今天还想仅以风俗、风情、自然景观来获得读者，却很难办到了。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五六十年代科技文化的落后，大众传播媒介也落后，人们对云南这片神奇土地的了解，文学成为重要的窗口，人们从这个窗口中，认识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认识了那些古朴奇异的民俗风情，认识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这块神奇浪漫的土地，感受历史的变迁，新生活的美好，从中获得审美感受。而在八十年代，电视机的普及标志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进步，人们要了解云南，文学已失去了五六十年代的优势，人们心理空间相对缩小，云南这块神奇土地的“神秘感”也比五六十年代大大淡化了。

“题材至上”的心理定势使一些对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并不熟悉，或了解不深的作者，舍自己熟悉的生活，来抓边地、少数民族题材，于是生硬编造、张冠李戴，败坏了云南文学的声誉，另外一些作家走入搜奇寻异的死胡同。摩梭人的古朴婚恋，母系氏族公社的残余生活方式，苦聪人的莽林生活，都有人写过了，可是没达到预想的效果。被称为“活化石”的云南还会有许多奇异的生活被发掘，但是，发掘和提供“活化石”不是文艺家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的任务，我们如果靠这些东西来引起注意，其实只不过是悲哀地满足了外界的“博物馆意识”。

沿着“题材至上”的心理定势去思考，编辑、出版社，理论批评界所宣传和倡导的，往往也只是在题材层面上翻新。“军事题材”“边地小说”其实都只是题材层面倡导。问题在于：云南提倡“军事题材”却没有能推出军事题材的拳头作品，而不在这个提倡范围内的莫言、李存葆、刘亚洲等人却推出了可以称为“军事题材”的震撼人心的作品。沿着“题材至上”的心理定势去思考，我们总想不断地拓展出新的题材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境内的边地、民族、军事等题材都未能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后，近年来又热衷于“境外题材”了。由于历史的原因，云南省有些人到过邻国，有的在“缅共”工作过，这些当然是奇异的经历，但这样的题材拓展能使云南文学摆脱窘困吗？相反：近年来在全国产生了影响的云南青年诗人于坚，青年作家姚霏的作品，不是题材意义的成功，而是以强烈的现代意识获得了读者。

“题材至上”的心理定势，使云南文学界常常醉心于对象世界的特点，苦苦思索怎样才能真实地写出这些特点，因此也迷失于对象世界的特点中，困惑于这些特点中，而很少对创作主体自身的特点进行审视，以对客体世界特点的追寻来替代作家主体特点的追寻。观照生活，阅读别人的作品时，眼光停留在题材层面上，不太注意进一步思考，开掘这一题材所包含的内蕴。总是问：“你写什么？”而不是问：“你表现什么？”

题材，只是作家表现内心的载体！

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趋势就是：向内转。它有两层含义，一是转入性格主体（对象主体）的内心世界，多层次地开掘人物的心理，重视人物的感觉、情绪、心理流程；二是转入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在作品中强化作家的主体意识，作家笔下的客观世界只不过是作家主体观照下的客体，如莫言所说，我心中的战争。近年来成功的作品无一不熔铸了作家自己强烈鲜明的主体意识。而作家笔下的世界是否像我们感觉的一样“真实”，这个问题已退到了次要地位。在那些成功的作品中，我们都不难挑出局部、细节的失真。云南文学的落后我以为是落后于“向内转”的趋势，又特别是作家的主体意识在作品中表现比较贫弱，不少作品满足于直观写出边地、民族特色。作家的思维中心在于如何准确地反映出边疆、民族生活的特点。“能动反映”只是生动性、真实性的程度，是以作家主体外在物为旋转地。近几年来文学观念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云南文学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它就是：“价值论”对“反映论”的补充。文学不仅是生活的反映，它还是建立在人的需要基础上的价值浮动，如果停留在客观地

反映上，文学就失去了之所以作为文学的价值，文学的真正目的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生活是载体。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系统已经开始建立，超越外在的物的特点、表现作家内在的特点已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共同追求。

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弱、新旧，乃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就以云南文学史上成功的例子来说，也能部分地看出优秀作品的作者，他们的思想理念背景在当时都是新颖的。我们不会忘记作家艾芜，他用一双足板亲吻了一下云南的山水，从北到南走了一条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给人们留下了影响巨大的《南行记》，写出了人们身在其中而没能看到的边地风光、民族风情。我认为贯穿《南行记》始终的是强烈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正是在这个当时是绝对新颖的作家主体意识背景下，他对生活的观照才发现了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美好灵魂，写出了在当时大汉族主义歧视与压迫下的少数民族的美好心灵，他以抒情笔调礼赞偏僻山区下层社会人民顽强的生命力。边地风光、民族风情只是他寄托“平等意识”“自由意识”的载体。

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学的成功，除了题材的新奇这个客体原因外，还应从作家主体的角度审视。当时的作家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随解放大军进入云南的外来作家群，特别是昆明军区创作组的那一批精英，二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步成长起来的云南籍作家群。他们都有对翻身解放的无比兴奋，对新生活的热切渴望，作家内心追求的“新”与现实生活环境的“旧”形成了过于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文学的成功也就在于这一对比与反差之中。外来作家群，以“新”的主体意识背景，处处见到激发灵感的事象，云南作家则以对生活本身积累见长，“新”的主体意识则给予了他们重新审视生活的钥匙。可是，那是一个“颂歌”的时代，作家们只注意到了或者只写出了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大多数已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生活了数十年，作家内心与生活环境认同的多，反差的少，比照已没有五六十年代的强烈。加之作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部世界的特点上，忽视了创作主体意识的审视，难以写出极有个性的作品。为什么云南如此众多的“民族题材”作品给人轻飘飘的感觉，缺少厚重感，缺少力度？原因在于创作主体而非客体。比如，云南是个落后地区，经济水平、道德观念、生活生产方式都有许多令人摇头叹息的东西，但从云南文学作品中都难以见到对落后事象决绝的恨，也难以感觉到深沉的强烈的爱。本民族作家写的作品，由于对本民族的特殊感情，使他回避落后，其他民族作家来写，又有种种顾忌，再加上五六十年代“颂歌”时代的传统，使作家们在作品中往往对“落后”

进行美化、诗化。这其实反映出创作主体缺少历史、哲学意识，缺少大文化意识，无法更好地把握和处理题材。我想起藏族作家扎西达娃作品的力度，云南文学在等待云南的“扎西达娃”。

我以为，超越题材，强化作家的主体意识，是当务之急。这里需要两个“走出来”：一是从文学中走出来，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理论修养。近年来心理学、文化哲学等学科对文学的渗透已经成为客观的现实，读者的审美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较高层次的文学除了强烈的感性特征外，还有明显的理性色彩，这其实是给作家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从生活中走出来，不仅要深入生活，还要走出生活，开拓视野，然后再反观生活，将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与认同。云南的闭塞，使作家尤其需要开拓视野，使自己所处的生活增加新鲜感。

超越题材，不等于“抛弃题材”，它将“题材”包含其中，透过题材层面，重点在于审视作家表现了什么？渗透、熔铸了什么样的主体意识？这些题材是否是在作家现代意识审视处理下的题材？作家写什么题材，只不过是一个自然的东西，熟悉什么就写什么，在云南，边地、少数民族、高原当然用不着回避，也回避不了的。

写什么都行，关键在于表现什么！

——《昭通文学》1989.3



边地小说与主流文化

云南竖起“边地小说”的大旗已有些年头了。什么是“边地小说”？什么是“边地”？有人把它当做与“城市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边地”就是乡野；有人又把它解释得无所不包，或者，它干脆就是云南文学的代称；更多的人把它当做一种“地域文学”的概念使用。对“边地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人们尽可以做出种种不同的解释，在并存与碰撞中求得对它理解的深化。对一些理论概念，作家们尽可以掌握得模糊些，在一个大致不差的范围内写作并写出好作品就行了。但是，“边地小说”作为云南文坛号召作家的一面旗帜，评论界理应对它做出深入的阐释，以利创作。

一、地域边地与文化边地

作为“边地小说”的“边地”，它不应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边地，换句话说，地域性不应是边地小说的主要特征。边地小说的“边地”应是文化意义上的，指的是主流文化波及的边缘地带。它与地域的“边地”有重合也有差异，这是由于主流文化波及的不平衡造成的，主流文化波及薄弱的地方都是“边地”。乡野的大部分是边地，小城镇的一部分，甚至都市的一部分也带有浓郁的边地色彩。在这些地方，主流文化没有能够完全深入，它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单元，

人们以自己固有的文化指导自己的生存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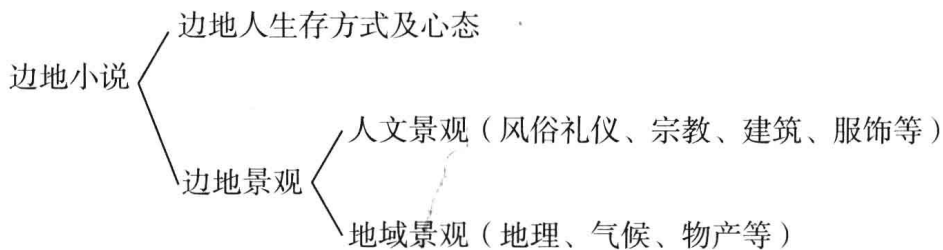
落笔至此，我不能不对“主流文化”作点简单的说明。主流文化是曾经占有或将要占有统治地位的文化体系。它的一种类型是，在生长和前进中的文化体系，它充满了新的生命力，代表了时代潮流，并且已经辐射和囊括了相当广泛的地域。在今天，它包括了现代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现代人的生命哲学意识、现代人的时空观念、现代商业经济意识等。它的另一种类型是，它虽然已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但它曾经在过去的时代在广大的地域占统治地位，并且至今仍有强大的影响力。比如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系列文化形态。

云南由于地理和交通的原因，相对于中原和沿海，至今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同时，它的内部又由于同样的原因加上多民族的特色，形成了许多相对封闭的单元，主流文化的波及始终受到重重阻碍。在一些乡野，深刻的社会变革，时代的惊涛骇浪，到了那里，只剩下了死水微澜，小小的风波，主流文化的波及极不平衡，留下了大量的边缘地带。

从文化意义上去理解“边地”，边地小说对作家的要求就不仅仅是熟悉地域的问题，熟悉生活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作家从事创作不能抱着冷淡的职业的心境去客观地再现边地生活内容。作家必须对主流文化有深刻的体会和把握，甚至化为自己的血液灵魂，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以这样的主体心灵拥入边地，走进主体文化波及薄弱的地方，在强烈的反差中激起自己强烈的爱与恨，激起自己灵魂的震颤，才能真正发现地域的特征，写出真正意义上的边地文学。当一个作家写不出好的边地小说时，很可能不是他不熟悉边地生活，而是不具备主流文化的观念意识。这就不仅需要他走入边地，还要走出边地，往最富有主流文化特征的地方走，同时还要坐下来，对主流文化的经典进行认真的阅读与思考。

二、人的生活与生活的人

边地小说，必然要包括“边地人物的生存方式及心态”，“边地景观”两个部分。在边地景观中又包括“地域景观”与“人文景观”。图示如下：



谁也不否认边地小说的中心是人，谁都在说仅写出风光风情远远不够，要写出边地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命运悲欢。然而，将边地小说的内涵放在“地域”意义上，必然导致对“边地景观”的强化。一是对地域景观的刻意描摹，群山峡谷，松涛河流，竹楼界碑；二是对人文景观的着意追寻，婚丧礼仪，宗教服饰，奇风异俗。以为展示了这些地域文化也就使作品有了艺术价值。确实，从二十多个民族的服饰上各扯下一条花边来，就可构成一片绚丽的彩霞。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学曾以这种神奇性作为一个鲜明的特征，在全国造成深刻的印象。由于对五六十年代文学以及艾芜的《南行记》的成功经验缺乏深入的总结，相当一批人停留在理解它的表象特征上，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边地景观”的意识。尤其是风俗、宗教、礼仪、服饰、建筑等人文景观，它充满了特定地域的人文气息，它是“地域景观”和“人的生存方式及心态”的中介物或过渡带，文学作品描写了它，就获得了地域特色和当地一定的人文气息，也涉及了一定程度的人的生存方式和心理。因此，描写它是一种捷径，只要对生活有相当的熟悉程度，是最容易做到的。然而，容易的也常常就是浅薄的。

反映了人生活的地域景观和人文景观仅仅只是写出了“人的生活”，文学要求作家的却是“生活的人”。

包括地域景观和人文景观在内的整个边地景观，只能作为边地小说中人的生存方式及心态的背景。作家取景框中焦距的清晰点是人，有时，背景甚至可以被虚化。

首先是以主流文化来观照边地人物的生存方式、命运悲欢、生命意识等。它是一种展示，更是评判，审美的历史的哲学的评判。说起边地文学，我们常常忘不了艾芜是受“五四”新思潮冲击后，吸足了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化的营养后走入南部边地的。因此，他对南部边地的审视与表现，是在五四新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南行记》贯穿始终的是“平等意识”“自由意识”以及“爱的哲学”，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倾注了艾芜对边地人生的愤懑和同情。他不仅仅是客观地展示边地人生，更重要的是以他所具有的主流文化来评判边地人生。

其次，在主流文化的观照下，风俗民情在作品中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必然地渗透了作者的主体意识。一个具备主流文化背景的作家，对风俗民情等人文景观的取舍与表现，在内化与外化的过程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评判与改造。我们不会忘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充满浪漫气息的田园牧歌，

淳朴自然的乡土人性美，风俗民情美。如果我们把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当做现实中真实的湘西世界，我们就可笑了。在审美原则上，沈从文不求“真”而刻意追求“美”。他将湘西世界的田园生活美化，理想化，对湘西世界的风俗民情也作了美的改造。根源在于他对现代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特殊理解，“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艺术思维中，是作为对另一都市世界的否定形象而出现的。云南边地小说对风俗民情的描绘，常常纠缠于它真实性的程度，而缺少对它内涵的深刻评判，无论是审美的还是历史的哲学的，原因在于作家对主流文化的理解既缺乏深度也缺乏个性。

再次，以主流文化作为思想理论背景来解析边地的特殊矛盾、特殊问题，会有新的发现，理解那里富于个性特征的生命存在方式和心态。边地人生中有许多对外来者来说是不可理喻的行为方式和心态，如果缺乏主流文化的思想背景，而将它展示出来，必然流于猎奇，或者流于使读者同样不可理喻。有时加上浅薄的评判，甚至会产生滑稽的效果。“山区要致富，少生娃娃多植树”这一标语已深入到任何一个滇东北高原的穷乡僻壤，它可以看做是主流文化波及的象征。然而，那里的人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生存，荒山秃岭、娃娃成群仍是普遍现象，滥伐与滥生在严厉的行政、法律措施下仍不能禁止，演出了一幕幕的悲喜剧。面对贫困和愚昧，面对乡村干部的粗暴行为，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化人们常常陷入不知该骂谁的两难境地，痛心疾首地“不可理解”！在两难境地中任何一种简单的取舍都会导致荒谬和滑稽。但是，如果我们对“大生产必然导致小家庭，小生产必然与大家庭相联系”这一铁的规律有所认识，我们就能从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阶段，去解析边地人生面临的困窘，理解他们不可理喻的行为与心态并非仅仅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而这一行为与心理又与整个国家及他们自己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冲突。这样，也许我们能在这个方面写出更有深度的边地小说。

当边地小说不以文化性而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时，作家注重的是人的生活，因此误认为要写出成功的作品必须往深山里走，往荒原峡谷里走，误认为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有云南边地文学的希望，写不出好作品是因为还不熟悉那里的生活。人们似乎忘记了反问一句，一些曾经长期在基层甚至现在仍在基层，又有相当艺术表现能力的作者为什么也写不出足以震撼人心的作品？文化意义上的“边地”则不以地域为限制，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审视主流文化波及的程度，该地固有文化的强弱。因此，在云南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体验各种类型边地

人生经验，道德理性力量，人的生存状态及心态。因为云南就整体来说，相对于内地和沿海，仍然处于主流文化的边地。特别是在时代交替，主流文化和固有文化交流碰撞激烈的地方，更具有丰富的内容，丰富的人生体验。这里缺少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作家眼睛和心灵的发现与感悟。从文化意义上理解深入生活，就不仅仅是单向的往深山里走，它是双向的，还应往最富有主流文化特征的地方走，在强烈的比照中才能发现差异与个性，发现文学的生命之灵。只有作家具备了丰厚的主流文化意识，用心灵去突入边地、感悟边地，通过主体心灵折射出现实人生，才能写出“生活的人”。

三、自然的人与人化自然

植物王国，立体气候，横断山脉，群山莽林，奔腾的河流，刀劈斧削的深山峡谷，还有随风摇曳欢唱的凤尾竹，四季里变幻多姿的彩色流云……大自然赋予了云南雄奇、神秘而又迷人的地域景观，由于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发展的相对迟缓，人们会感到人和大自然特别贴近，自然界和人几乎融为一体。这一边地特色也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人不是在纯粹的社会形态中生活，而是在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的边地景观中生活。上文主要分析了边地小说中人与人文景观——社会形态的关系，这里主要分析人与地域景观——大自然的关系。

人首先是“自然的人”，是整个自然界的构成因子，人无时无刻不受到自然的约束和影响。崇山峻岭的地貌特色首先造成了自然对人的封闭状态，各种群体之间交流的困难，使他们成为相对独立的封闭单元。生存方式、性格特色、思维方式都决然不同，甚至影响到群体的“身高”这样的人种特征。

地域景观是导致当地人文景观最重要的原因。建筑、宗教、礼仪、服饰等都或隐或显地打上了地域景观的深刻印迹。傣家那支在空中的竹楼与当地潮湿的气候显然有关系，彝族的察尔瓦与崇山峻岭里怪石林立、荆棘丛生、风雨变化无常有密切关系。高山和河流不同的巫术文化中也刻下了地域景观的印迹，“山鬼”给人狰狞可怖的山地特色，“水妖”则妖媚动人，柔情似水。水妖那迷人的歌声和山鬼那松涛般的吼叫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地域特色。

在云南，可以说翻过一道山坡，涉过一道河流，飞越一座峡谷就有一份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然而，今天毕竟已经是二十世纪末，大自然的地域景观已经不能完全阻挡以现代文明为特征的主流文化的冲击。当无线电波无孔不入地

叩响山林，当公路无情地射向重山的心脏，必然地造成了封闭单元内的激烈震荡，进而影响到人文景观的改变，性格特征、价值标准、思维方式的变化，甚至群体的身高。被改变了的人又反过来对自然发生着影响，有时是进一步美化它们，有时是更有效的利用它们，有时则是毁灭性的破坏。边地小说在塑造“自然的人”时，不能不考虑到主流文化的深刻影响，考虑到它所造成的复杂矛盾。

也许在纯游记文学中云南的边地景观本身已经具备了绝对的价值，而作为以人为中心的边地小说，它却仍然只是一种背景。作家要写的不仅是“自然的人”，还要写出“人化自然”。对自然的描绘必须蕴涵了作家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对自然的不同领悟，它不仅仅是对地域特点的反映。无论对这些特点描绘得如何逼真，如何雄奇、美丽，一旦离开了人的精神凝视，离开了作家的主观色彩，对自然的理性思考，它在边地小说中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沈从文和艾芜。他们都不是随意地见景抒情，不是处心积虑地忘情山水，在他们的笔下，自然景物是边地人生存的背景，他们甚至将自然赋予了某些象征色彩，从人的生存角度，人的生命意识对自然作了一定的理性思考。在描绘自然时，他们已经对客体的自然作了主观的改造，涂抹上自己的主观色彩。沈从文笔下的辰河流域自然景观，表现出宁静、舒缓、优美和庄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虔诚的宗教感。它是沈从文眼中的湘西山水辰河风光，也是那些淳朴善良的老人、英俊的少年、美丽的姑娘相亲相爱生存的背景。无疑，湘西山水在沈从文的笔下已经“人化”了。艾芜笔下的云南山水却是另一番景象。江水在恐怖地奔腾，夜晚莽莽的原始森林里震响着吓人的松涛，艰难地行走在刀劈斧削的深山峡谷，耳畔传来野猴的鸣叫。连“两岸蛮野的山峰，好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这多么切合一个离乡背井，异地漂泊者的主体心灵，又与那些被抛出正常生活轨道，遁迹山野、苦苦挣扎的“化外之民”如此贴近！因此，它仍然是“人化的自然”。

边地小说，我衷心地希望你走向深刻，走向新的成熟！

——《文学界》1992.4